

希望之苗：反思反貪倒扁運動*

趙剛

The Germ of Hope:
Reflections on the Anti-Corruption and Anti-Chen Campaign

By

Kang Chao

關鍵詞：反貪倒扁運動，本土優先論，群眾運動，民主，分裂的國度，兩岸關係，顏色革命

Keywords: Anti-Corruption and Anti-Chen Campaign, Taiwan over all, mass movement, democracy, divided nation, cross-strait relation, color revolution

*本文的主體寫作完成於 2006 年 10 月下，也就是在陳瑞仁檢察官 2006 年十一月三日公布起訴書之前。本文在寫作與修改期間曾有三次公開口頭發表的機會。2006 年十月二十一日應瞿宛文的邀約，於紫藤廬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同仁報告。2006 年十月二十九日應《批判與再造》總編輯杜繼平先生邀約，於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五樓所舉辦的《批判與再造》五週年慶祝座談，報告本文第一部份「紅衫軍運動的特徵」。2006 年十一月十日應倒扁總部論述小組召集人呂學海先生邀約，至台北火車站前倒扁總部，報告本文第二部份「運動為何勢消？」。這些對話機會對我的思考與寫作幫助甚大，在此表示誠摯感謝。最後，謝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摘要

反貪倒扁運動於 2006 年九月九日開始聚集群眾，歷經三次大型動員，於十月十一日之後，快速勢消。儘管其前途未卜，但這個運動已展現出很多重要的特質，並引發了很多重要的問題與爭議。本文嘗試以一個參與觀察者的角度，並從一個激進民主的立場，對這個運動到目前為止所展現的三個特徵（非組織性、歡欣愉悅，以及抗拒崇高性）進行討論。其次，本文將嘗試回答這個運動何以在十月十日的高度動員後，走入消沈。提出了三個原因：方向混亂，社會基礎沒有擴展，以及綠營成功打出本土牌。本文討論了本土牌的社會與文化基礎，並指出兩岸關係的最終解決是台灣民主未來的關鍵點。最後，本文比較了新世紀以來的「顏色革命」與紅衫軍運動的異同，並指出後者的當代的實質民主的激進意義。

The Anti-Corruption and Anti-Chen Campaign initiated in early September 2006 went through three major mobilization peaks and went into an abrupt decline in the mid-October. In spite of its uncertain future, it is time to explore into the processes of the movement and reflect upon its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vement are closely examined, which are non-organizational, hilarity, and a tendency to resist the sublime. Three factors are spotted for answering why the movement fell abruptly: disorientation of the leadership, failure in canvassing broader suppor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trategic leveling up of “ethnic” conflict by the DPP. I argue that for a healthy and substantive democracy to grow in the futur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 has to find a way to break the current deadlock. Finally, the US-backed color revolutions in recent years are juxtaposed with the red-shirted movement.

禮 義 廉 恥 ----- 凱道廣場上空的四個大氣球
2006/9/9- 2006/9/15

有夢見鬼 燒炭相隨 ----- 凱道廣場民眾標語 2006/9/9

燒炭跳河萬六冤魂怨氣直沖中正廟
貪腐濫權六年總統劣行果遭現世報
民不畏死（橫批） ----- 中正廟前「台灣社會論壇」旁台灣一萬六千
位自殺者亡靈神位的條幅與橫批
2006/9/7- 2006/9/15

阿扁加什麼油？
家庭自殺連連
物價升漲連連
欺世盜名連連
國際笑話連連 ----- 台北火車站廣場民眾標語 2006/10/9

人民法院判決陳水扁死刑
曾益盛許永欽屠殺人民尊嚴
國營事業民營化 XX 顏大和 ----- 台北火車站廣場民眾標語 2006/10/9

總統腐 百姓苦 ----- 館前路前一遊行者的手持標語 2006/10/10

請大家告訴大家 台灣**安定**才是福 ----- 南投縣民進黨黨部看板
2006 年九月中旬後開始懸掛

德不孤 必有鄰 ----- 台北火車站廣場「花蓮後援會」布條
2006 年 10 月

反貪倒扁運動自九月九日正式集結始，歷經三次動員高潮（九月九日、十五日、與十月十日），至今已一月有餘，在這期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台社同仁，積極投書報章，介入關於這個運動的論述，論述介入的足跡也大多收入到《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展望》這本小冊子裡。小冊子裡的短文，關切的問題不盡相同，觀點也未刻意求同，但是，對這個新興的且在很多方面迥異於往的群眾運動，台社同仁在兩點核心立場上是相同的：一、咸認這是一個深入理解台灣社會，並向群眾學習的重大歷史時機，因此在基本態度上並不取高姿態之虛無否定，從而，不少立論其實是對持否定姿態的「左」或「右」觀點的抗辯；二、作為一個自許進步的知識份子結社，咸認有必要在現實基礎上，召喚、呵護、灌溉這個運動內生的希望與進步之苗。是在這個立足點上，台社召喚超越藍綠的「自主公民」的進場。款款衷心，一如這本小冊子的編者馮建三教授的編後語所指出：「通過這本小冊子，台社在向群眾喊話，在向群眾投射，在與九九運動領導階層與群眾互動」。¹

但關於應然的投射與期許，也必須辯證地與關於實然的調查研究相互論詰。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研究者，以及此次紅衫軍運動的現場觀察者，我確信有必要以更經驗、更歷史的角度，對這個運動進行階段性的反思，特別是在十月十日之後，當運動面臨了氣勢消沈與群眾散去的最大危機時，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勢消氣散？又，到目前為止，這個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性聚集展現出哪些特質？為何它（如馮建三所言）「迥異於昔」？哪些方面「迥異」，又有哪些方面是既存的社會條件或頑強的歷史遺留？如何理解、評估這些現象與問題，似乎沒有等待的理由與心情。當然，學術上最安全穩妥的作法是等一切塵埃落定，事後諸葛，回顧前塵，但我選擇在此時，運動未來未卜之時，進行檢討，當作一種歷史見證，如果未來的發展證明我的觀察與分析的短視與錯誤，就讓這個短視與錯誤當作一種日記的真實，從而也是歷史的一種真實，不跟隨局勢的改變而修正此時之所思。

2006年九月九日起，我連續在凱道上觀察了七天，並參與最後一天的「圍城之夜」，之後，我參與觀察了十月十日的「天下圍攻」，當晚與抗議群眾留在忠孝西路上，直到翌日清晨兩點半離開。在這些日子裡，我除了觀察，也作了影像紀錄。現場的親身觀察與記錄，對於幫助我提出問題，以及形成論點，是至關重要的。在下面的討論裡，我主要處理兩個問題，分別是這個運動的特質為何，以及為什麼這個運動在十月十日（如非更早的九月十五日）之後，開始有明顯轉弱跡象，這個消沈如何解釋？在嘗試提出的幾種初步解釋中，我相信扁政權選擇再

¹馮建三，〈編後語〉，《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期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2006，p. 94。

度啓動「本土優先論」這個運動外部因素，對運動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我將特別在第三節對此提出討論。在最後，我把紅衫軍運動擺在全球的美式民主的「顏色革命」的脈絡下，指出紅衫軍運動的獨特歷史意義。

一、紅衫軍運動的特徵

這次反貪倒扁運動，如就運動的主體紅衫軍群眾而言，有兩大突出特色：「非組織性」與「歡欣愉悅」，我將分別討論。在這一節的最後，我將在已有的分析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紅衫軍群眾何以有「抗拒崇高化」的特質，並嘗試說明這個特質與台灣社會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

1.1 「非組織性」

總部登高一呼，群眾從四面八方來到現場，沒有傳統的政黨或是社運組織動員機制。十月十日天下圍攻那天早上九點不到，我從大直美麗華那一站上 247 公車，車上已經坐滿了人，有穿紅衣的，也有沒有穿紅衣的，就像平常的巴士乘客一樣，大家安靜地坐著或站著，只有三三兩兩的在低聲交談，但到了台北車站，這些人全都起立魚貫下車，此時車外的火車站廣場以及對面新光三越已是人山人海紅潮遍地，車內的人顯然感受到車外的熱騰氣氛，開始有了一點喧嘩聲，表情也展開了，幾乎每個下車的人都表現出一種年節的愉快，以超乎平日的公民禮貌向司機說謝謝，有人說：「這根本是倒扁專車嘛！」，司機向每一個下車的乘客答謝並報以微笑。我拿著攝影機對著下車的乘客，他們幾乎都沒有抗拒鏡頭，看來不少人是獨自來的，也有人是結伴而來。

群眾參與到這個運動，既沒有政黨或其他正式組織動員機制，也非經由某種公民結社的連結方式進入到這個運動。群眾主要是透過媒體而來，共構情感共同體，群眾內在結構高度沙化。「不約而同」是我所看到的最突出的參與現象。以往的群眾運動，至少在動員來到現場的這部分是組織介入的（經常的方式是幹部配額制），雖然人們到了現場之後的「參與」也是「非組織性的」。上世紀八〇年代末以來，大概只有兩次群眾運動和這次的紅衫軍運動在非組織性集結這方面有類似之處，一次是 1989 年八月二十六日由「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所發起的「夜宿忠孝東路」行動，另一次是 1997 年五月四日的「五〇四悼曉燕，為台灣而走」的遊行。²但這兩次群眾聚集的時間甚短（都不到半天就結束了），規模也相差甚大，而且也有部分的社運組織動員。

根據不同的立場或偏見，論者稱這些運動參與者為「老百姓」或「法西斯暴民」，但都共同指出，這是一個沒有經過現代公民結社過程的原子化個體的集

² 謝謝鄭村棋指出這點。

結。³這些立場左右懸殊的評論，所共同忽略的一點是歷史上「街頭群眾」(crowd) (也是「烏合之眾」)的頻繁現身與作用。街頭群眾作為一種爭議性的政治動力與主體並不全都是反動的，遠的，展現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革命街頭群眾；近的，有法國1968年五月的革命街頭群眾，以及1999年底西雅圖反世貿組織的抗議行動。參與到這些歷史事件的群眾並非嚴格意義的被組織動員而來的。這樣的街頭群眾，經常被論者直接貼上善或惡的標籤，以各自的意識形態稱之為「公民」或「暴民」，而導致了一種理解的短路，無法進而理解，他們的行動後頭，有何巨大心理動能與社經緊張態勢，讓他們「不約而同」？其實，進步的社會史學者已經指出「街頭群眾」不是一個概念抽象，或單純只是一個數量上的蔚集，所謂民藪 (multitude)，而是由「有不同社會需求的普通男女所組成的，企圖回應多種不同的衝動，而經濟危機、政治動盪、以及解決他們立即且特殊的怨懟的欲求，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⁴相對於這樣的理解與分析的態度，很多論者對這群紅衫軍群眾，有過多立即的定性，但卻缺乏基本的理解功夫。

當然，把台灣的紅衫軍廣場群眾和跨越幾世紀的巴黎激進革命街頭群眾相比，有些直觀上的不倫。的確，明顯的差異是存在的，可以就運動的政治構造和空間能力這兩項來說明。

首先，紅衫軍群眾與倒扁總部（特別是施明德）有一契約關係；每個人投入一百元作為支持運動的具體表示，以及在實際參與時服從運動總部領導的承諾。總部如此期望群眾，群眾也很有可能如此自我暗示：作為共同體的構成單元，我願意把政治參與（即，價值論述與集體決定）的權力讓渡給總部，成為某種「在場的旁觀者」。群眾把參與到這個政治過程（不論稱之為實質民主、參與民主、或審議民主）的資格或權力讓渡掉，並不純然是總部的「設計」，而更可能是因為這本來就是群眾不知如何進行，沒有習慣與能力進行，從而樂於交出的「麻煩」。但站在激進民主的角度，一個運動如果失掉了這個過程，就算達到了運動目的，也是很有問題的。

這其實是按照古典契約論的「文化邏輯」的操作，也就是「人民」為了要終結某種混亂的「自然狀態」，自我讓渡權力給一外在機構，由它來終結此一混亂狀態。在這種社會契約狀態下，總部即是一「擬國家機器」，擁有了決策的權力，領導並「代表」群眾；這個權力關係展現在空間上，即是靜坐區被分成貴賓席與民眾區，前者保留給總部領導群體與其他不論是受邀或自行對號入座的「貴

³ 進步知識份子內部關於紅衫軍運動的定位爭論，請參考由「新國際」所主辦的「公民不服從對談」，特別是其中丘延亮與蔡建仁的對論，蔡建仁強調運動參與者的前現代性、前公共性，丘延亮則對這樣的政治定性提出了質疑。對談文字見《新國際》2006/10/20, pp. 4-5；網路版請見 http://intermargins.net/Headline/grafi/Activity_03.htm。把這場運動視為法西斯群眾聚集的則是林濁水，〈一元主義小心社會撕裂〉，《中國時報》，2006/09/21, A14。

⁴ 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1959, pp. 232-233.

賓」。總部期待群眾按照這個應許進入到這個契約關係，並形成「特定任務導向的代表民主制」，而總部的領導正當性即在於「不是陳水扁倒就是我施明德倒」，以及絕不以此追求個人政治前途的「黃昏之戰」承諾。這個承諾，擺在傳統中國官民對抗的文化語境中，其實就是表明施明德絕不會當「宋江」，挾力等待招安，並暗示他可能會是「晁蓋」，有犧牲的準備。可以說，核心靜坐區的「閱聽人」群眾基本上是以這樣的一種契約關係進場的，但是廣場邊緣的、站立的、抒發的「敲打族」則是一直無意識或是半意識地疏離於這個契約關係。關於廣場群眾的異質組合，稍後還會討論。

進入到這樣一種「特定任務導向的代表民主制」的紅衫軍，儘管來自不同社會背景，有多元的苦悶感受，但政治意識過於直觀性，且明顯欠缺政治論述的習慣與能力。凱道上或是火車站廣場上民眾所張貼的標語或大字報，從運動開始到今天，大致是環繞著陳水扁或相關貪瀆一族的道德指控，但這並不可被解讀為群眾的苦悶與挫折只在於「陳水扁」，其實，很多的社會苦痛與挫折其實是掩藏在表面的「指控個人」之下，只是缺乏論述言詮，拆解代名詞而已。好比，我在九月九日第一天的凱道聚集，就在中山南路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個黑色的看板，上書「有夢見鬼，燒炭相隨」（針對的當然是陳水扁 2000 年大選的主軸口號「有夢最美，希望相隨」）。這是多麼魯迅筆下的「女吊」式的社會抗議啊！這些被壓抑的意義沒有被詮釋抒發，是知識份子的失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運動的政治構造和民眾政治意識的直觀性是有影響的。

其次，紅衫軍雖是非組織性群眾，但空間活動力卻反而非常保守，傾向於劃地為牢，不只會自發地在城市中流動，形成多重中心，反而是有一種強大的向心力，並表現出很強烈的「失去中心焦慮感」。這個焦慮感很清楚地反映在群眾對「由上而下的噪音」的需求（這就是為何每次大型活動需要那麼多「副總指揮」的緣故了）。總部最先設計的抗爭主調是「靜」，大家靜坐示威，沒有帶動情緒的演講，取消或減少振奮的口號，唯一的聲響是代表高度文明的交響樂，以及作為憤怒替代的電子雷，但運動馬上就得和台灣社運現實妥協，總部（對群眾而言，其實就只是主體靜坐群眾前方的司令台，或是街頭的指揮車）隨時得有聲音，不管是演說、呼口號、音樂表演或是放音樂；似乎指揮中心也必須是個噪音中心，提醒「事件正在進行中」。強調這是噪音，意思是說，聲音的內容為何並不重要，而是必須要有聲音。運動進行中，總部由上而下的聲音是不能間斷的，但這並不意味聲音是有實用意含的，群眾不一定會（或能）接受總部麥克風的行動指令；我觀察到，不管是高分貝麥克風要求群眾靜默，或要求群眾在凱道左右兩邊形成單進單出的動線，基本上都是徒勞的。更極端的例子是，連有「組織訓練」的特定群體也是一樣，十月十日晚上簡錫堉在總部宣傳車上，以擴音器動員那幾百位受過「和平非暴力抗爭」訓練的勇士，前往忠孝西路民眾與警方對峙之間的區域，但沒有任何動靜。

大多數民眾在意識上必須時刻有一外在焦點，要不然會有深刻的「失去中心焦慮感」，而離開現場是最可能的選擇。十月十日晚上，本來忠孝西路上已經被數千名群眾佔據了，但之後有兩、三個小時整個總部人員都消失了，指揮車上沒有人，群眾相應明顯散去。到凌晨，忠孝西路上只剩下幾百人，總部卻出來宣布因為人數不夠，「沒有自然溢出」，所以要撤道。這裡並不是要追究責任，而是指出群眾散去和中心消失（即，噪音的停止）有密切關係。

「失去中心焦慮感」是就這個運動的主體群眾（即閱聽人）而言，但這個運動仍有自己的「特色」，始終有和總部進行噪音競爭的人群；就此而言，這個運動展現了台灣社會運動較少見的異質空間。這些在凱道面對景福門或火車站面對忠孝西路的「敲打族」，他們不在意總部的大喇叭在說或唱什麼，完全自得其樂，有自己的抒發對象，即過往車輛或路過者。但他們畢竟是運動的邊緣部份，無論就空間、人數、還是社會背景而言。

儘管就政治構造（意識）與空間能力這兩個標準而言，紅衫軍顯然不類 1789 年巴黎的「無套褲」革命群眾，也不類 1968 年的巴黎革命群眾，雖然三者都可說是以廣義的「中產市民」為主體。但差異儘管明顯，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就算是最激進最去中心的六八年革命群眾，也一樣是致命地受限於其空間慣行，流竄的群眾最後總是回到拉丁區。因此，我們對紅衫軍的歷史定位，更恰當的方式是把它定位在台灣社會的社會抗議傳統中。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個「街頭群眾」裡的很多參與者的確是已經離開了「家」或其他慣性的生活空間，進入到公共空間，而且是要推翻一個民選總統，這在台灣甚或中國歷史傳統中是沒有過的，更何況很多參與者是一生中頭一次上街。十月十日晚上，在忠孝西路上的群眾，以其自然（即非經由指揮系統）形成的聚集，以群眾的鼓譟聚集，將列隊進入忠孝西路行人道上的鎮暴警察硬是逼回到南陽街。從這裡也看到，群眾的形態與動能其實也並非單一性的，或僅僅是高度自我規訓的「文明化」閱聽人所能代表的。根據我的觀察，十月十一日清晨，留在忠孝西路上的群眾，不少是我在景福門那一塊常見到的很眼熟的「敲打族」，當然這只是一個不算「精準」的印象而已。

對這個台式的「街頭或廣場群眾」，當然可以批評質疑，但拒絕理解則是不可思議的；固守傳統左派的組織戰原則抽高地否定這個新生現象，不僅脫離給定的歷史條件，更是自我剝奪介入新局創造歷史的契機。何況，在媒體特別是網路通達的年代，非組織性的動員，可能越來越多，規模也可能越來越大，面對這種新局，光是因為「沒有組織」這一理由，就取消它被認知理解的資格，是不恰當的。對街頭群眾這一運動或抗議形式的輕視，經常更不恰當地延伸到對街頭群眾主體經驗的傲慢否定，以各種字詞描述群眾，例如投機、善變、輕佻、消費、

追求刺激。但人們不是常說：「存在與實踐決定意識」嗎？果如此，那麼，這個很多從來沒有上街抗爭過的紅衫軍群眾，難道在經歷了一個月的磨難、昂揚與挫折之後，會沒有一種意識上的轉變？沒有一點主體自覺的變化嗎？我相信，以這次事件的規模與張力，歷史將會有「九九世代」(9/9 cohort) 這一詞的，而這個世代對於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影響還沒有真正開始。

1.2 「歡欣愉悅」

也許除了同志運動遊行以外，此次紅衫軍運動的參與者比台灣以往的運動都歡欣愉悅。同志運動場景的快樂氣氛是全球性的，台灣的並不例外，因此並不需要「何以台灣同志運動歡欣愉悅？」的特殊解釋，雖然同志運動何以歡欣愉悅本身可以是一個問題。相對於同志運動，此番反貪倒扁運動的快樂昂揚的基本氛圍則比較反直觀。在過去，工人運動的某些遊行場合，是出現過一些比較刻意經營出來的不那麼悲憤，也比較愉快的場景，例如「工人鬥陣」遊行中的黑手那卡西或是工人康康舞，但那個「歡欣愉悅」比較是侷限在特定的表演時間，而非參與者進場時，在基礎點上就歡欣愉悅。工人運動有直接的抗爭對象（不管是資本家、特定官署、政策或是法令），有立即的困苦挫折，宜乎不那麼歡欣愉悅，但反貪倒扁運動的立即目的是把一個威信貪腐的總統拉下馬，不是也並不自有快樂的理由嗎？有名嘴說，這是因為阿扁反正一定不會下台，大家就帶著遊戲的心情嘉年華一通，累了就回家，所以比較輕鬆愉快。這只是一個充其量合邏輯的猜度，但完全沒有一通群眾之情。我親身的觀察與體驗是，民眾感覺並表現出歡欣愉悅是因為，他們長期私下承擔著各種挫折與鬱悶，只能在私密的領域中表達憂憤，但「百萬人反貪倒扁運動」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空間與情境，讓人們突然在凱道廣場、在遊行街上，發現那麼多和自己一樣挫折鬱悶的人，這種集體的舒展、一種「人同此心」的感覺，是沛然有力的；那是一種集體治療，當然免不了也是一定程度的集體催眠。火車站倒扁現場掛了一大幅「德不孤必有鄰」，我想是相當忠實地反映了人們的某種集體正義感與力量感。「這麼多人一起做應該要做的事情」，單是這個自覺就讓參與者有力、愉悅——儘管弔詭地多數人同時自覺阿扁並不會因而下台。「紅色」這個總部事先所規劃的顏色被群眾接受，恰恰是因為它象徵了「大家一起來」的團結感，與「這是該做的事」的正義感。總部的這個顏色規劃是成功的，因為得到了參與到現場的人們的絕大支持；人們願意自掏腰包購買紅衫紅帽以及各種紅色商品。蓬勃的非正式經濟也幫忙襯托出一種台式的年節歡愉。

但這樣歡欣愉悅的群眾，來到現場後又怎能接受靜默的規訓？打從運動尚未展開，總部就要求參與的群眾進行靜默抗爭。九月九日第一天聚集時，總部不停用高分貝聲響，要求在場民眾「靜默」，形成了一非常荒謬的場面。靜默當然被群眾的歡愉行動否決了。行動的抒發性壓過了策略性與工具性的邏輯，一種「嘉

年華」的氛圍，特別鮮明地表現在九月十五號的螢光圍城的夜間遊行，以及凱道群眾中，面向景福門的那一邊緣地帶的群眾，鼓譟、昂揚、亢奮、身體與聲音在一種敲打樂（以汽油桶、紐澤西護欄、鍋子、口哨…等）的節拍與律動中，帶起一波又一波的狂歡高潮。這是紅軍中的站著的群眾，我樂意稱之為「敲打族」，和主體靜坐區中坐著的閱聽人群眾有很大的不同，參與者也比較年輕，比較不是那麼中產階級味，也比較「本土味」。

群眾來到現場後，馬上就可以進入到一種能高度調動身體感覺的有節拍感、有節奏性的集體發聲中。在這一方面，由總部所帶動的，算是比較低度開發的，還只能算是「上面帶領下面呼口號」，雖然已經比傳統運動口號要有趣，有變化了。真正創意十足、節奏感強烈、身體跟著律動的口號呼喊，其實都是敲打族民眾自發的。我目睹了運動開始時九月九日、十日那兩三天，群眾在自發的口號圈中，非正式地淘汰不順的、不爽的表達，選擇並定型出一種基本的重複吟唱調性，而尤以閩南語的表達最為有力。在每一個讓人搖頭擺尾的「XX 扁（或「阿扁仔」）——落台！」之後，參與者奮力地把大拇指往下一比，然後昂首歡然。⁵這種圍成圈圈的口號行爲，其實已經超越了台灣所有社運場合的調動情緒的方式，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活力與歡騰。說它是呼口號，已經不足以符徵現實，其實更是一種結合了部落或任何原始藝術中那種素樸直接的團歌群舞的「民主吟唱」(democratic chanting)，是一種人民的表演藝術形式。

但是，我馬上要回到的一點是，紅衫軍運動和同志運動是有一個核心類似性的，儘管以各種標準而言，反貪倒扁運動都不可能是一以同志為主體的運動，非但如此，反而可以說這個運動的很大動力，是來自主流中產異性戀者的某些核心價值（例如很多媽媽們所焦慮的「如何教育下一代？」這問題）。但是，和同志一樣，倒扁運動參與者到了紅衫人群中，見到這麼多志同道合的人，是產生出一種類似「出櫃」的愉悅。但短暫的出櫃愉悅，恰恰好也是由於回到日常生活之後，仍然必須要回櫃的鬱卒壓抑。必須指出的一個現實是，紅衫軍回到家庭或密友以外的生活世界中，他或她基本上還是必須要隱形的。倒扁風潮從九月九日開始，我在台中的校園與街上，沒有看過一個穿倒扁衣或戴倒扁帽的人。以台北都會區之大以及倒扁運動的大本營所在，除了重大的聚集（九月九日、九月十五、十月十日）之外，倒扁紅衣紅帽在日常公共空間中似乎也是非常非常稀有；在家門口或是車上綁紅絲帶，以表示對運動的認同，也異常稀有。甚至，我們聽說還有不少紅衫軍是背包裡帶著紅衫帽，快到現場才換上的。這是談論這個運動的「歡欣愉悅」時，所必須指出的月缺面；歡愉預設了禁忌。因此，「紅」既象徵了正義感與團結感的出櫃昂揚，同時也承載了出櫃的心理負擔。這個超乎直觀的複雜心理過程需要更深入的理解，但我在這裡想要順便呼籲的是：經過這場運動，反貪倒扁的紅衫軍參與者，也許更應同情地理解同性戀或其他文化弱勢者所承擔的

⁵ 「XX 扁」最常見的是「小偷扁」、「垃圾扁」、「骯髒扁」（以閩南語發音）。

社會壓制與禁忌吧！

愉悅歡欣不是這次運動的全部圖像，雖然是主要圖像。九月九日到十五日的總體圖像比較複雜。倒扁運動在凱道附近的空間分佈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展現了這個運動的體質結構。紅衫軍靜坐區是中產市民的閱聽人愉悅，面對景福門凱道邊緣的敲打族則是邊緣者的巫祝愉悅。跨過中山南路，往南，到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牌樓前，先會經過「台灣社會論壇」，這是企圖為這運動裝上大腦的所在，想要把「倒扁」加上一個有整體觀的社會論述，但可惜門可羅雀，每天晚上的論壇最熱鬧時不過五六十人。它旁邊有一「台灣一萬六千名自殺者」靈位，超渡亡靈的地藏悲音，和凱道上的翻騰喧鬧，似乎是兩個世界。這一塊角落在圍城前，曾經短暫紅過一次，就是馬英九來上香的那短短幾分鐘，人潮簇擁呼嘯如神明出巡，保鏢喝叱、記者吱啞，十幾架攝影機同時開機閃光，旋風驟逝，瞬間回歸孤寂。台灣社會論壇是在大門樓北側，南側則是民盟的活動場地。民盟的群眾穿黑衣的較多，圍城前，每天晚上總是有幾百人，但表情都比較嚴肅，和紅衫軍成一對比。圍城那天，黑衫軍編成了幾個旅，每旅五十人，有一些軍儀操演，表情嚴肅。民盟的群眾顯然比較有組織，以及與組織一起的某種責任壓力，以及透過演說或歌曲（例如〈梅花〉）所再現的某種「中華民國」或「藍」的歷史感。對比之下，凱道的「歷史感」則基本上是「不藍不綠的」，甚至是由於總部的關係，比較「綠」的，或更正確地，應說是比較像那七〇年代「黨外的」。漫步在這個異質空間，我不免思索：愉悅、論述、責任感與不同的（甚至大多時候是相對立的）歷史感之間，是否能有交互編織的可能，而非以目前的互斥狀態展現。「泛綠」要如何與作為象徵一個充滿了複雜矛盾、正負交加的歷史過程的「中華民國」和解，「泛藍」要如何與一個抵抗威權的、追求進步價值的、有包容性的黨外本土意識和解，以此雙向的理解打破現在的二元對立，是真正的大和解所必須面對的。

以紅衫軍的龐大群眾規模，為何沒有出現像歷史上很多超大型群眾運動中所展現的一種巨大的、超乎個人的，但確實被參與者所感受到的集體力量，讓個體自覺在全體中的渺小，這般類宗教性的異己的「群眾心靈」(mind of the crowd)現象？⁶反而是每個人都感受到一種來去自如的便利輕鬆；隨時加入，隨時退出。十月十日下午，台北火車站前紅衫軍群眾水泄不通，但走在其中，並沒有一種昇華的或異己的類宗教感，在萬千人中，我巧遇幾位台社同仁，大家聊了幾句、合影，然後到附近找地方坐下聊天，附近的咖啡店或餐飲店沒有不是擠滿了紅衫群眾的。我想起我的一位大陸朋友告訴我他看鳳凰台有關的紅衫軍報導，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參與者輕鬆怡然，令他想起多年前參加六四，天安門前最深刻的體驗就是個人在集體中的渺小，隨時被一種莫名的力量牽引驅策。我自己沒有類似的經驗，唯一沾上邊的是，我讀高一時（1971年），參加總統府前的雙十慶典，

⁶ Gustave Le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0.

我們學生被安排在很後頭，在景福門後老遠的地方，總統府都看不到，大家在那邊嬉笑玩鬧，那時候正流行的一些英文歌好比 Knock three times 或 Candida，有同學就一邊跳一邊唱。但就在那時候，聽到遠處的聲波如雷，「總統好！」，一波一波地壓到我們這兒，於是不管是跳舞的或是唱歌的或是發呆的，一下子都被那個超越個人的集體所振奮起來，不由自主的，奮力高呼起「總統好！」。這種感動，也許是所有法西斯群眾運動所必需的某種「美感經驗」吧！雖然這種經驗並不見得是法西斯所獨有，也不見得必然為負面之事。

不管說這是革命群眾，或是「法西斯聚集」，都是按照自身偏見的自由比附，其實只要稍微貼近現場，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紅衫軍兩者都不是，他們相當的世俗化、庸俗化、或日常化，不管如何稱謂，這裡沒有崇高美學、類宗教感、道德昇華，或異己的集體存在。這樣的一種「歡欣愉悅」的群眾何以形成，除了我前面所說的群眾主觀感受外，客觀上，這個運動的性格也受一些具體的社會與文化條件所制約。首先，運動從沒有拉高到一種道德的二元對立，陳水扁並沒有被妖魔化，A 錢是無法取得妖魔資格的，群眾只是很瞧不起他而已，而施明德也沒有被神聖化，群眾對他的支持有很強的工具性意味，殘忍地既把他看成手段但卻又期待手段負責。此外，紅衫軍也沒有將自身對立於民進黨，更沒有拉出統獨或國族認同議題。其次，廣場的靜坐區是比較自我規訓的閱聽人，在開闊空間聽司令台上的演講，接受口號帶動，同時觀看自己在內的大屏幕影像，自我在過程中被客體化，使激化昇華的集體感不容易出現；第三、自我被外在化還包括一種首善之區的「文明公民」的自覺，使得任何可能激發高昂情緒的行為或象徵率多為公民自我克制——電視攝影機都在拍，大家都在看我們，我們不能出亂子，我們要和「他們」不一樣。十月十號下午四點開動的遊行中，在忠孝東路上，一輛被視為企圖惹事的挺扁轎車，引發了一些遊行民眾的激動反應時，被更多的群眾圍成人牆保護離開。這種自覺當然在不同的脈絡下，也反映了台灣城鄉發展的差距，以及城市居民的某種驕傲自覺。

因此，紅衫軍的主體群眾既非革命群眾，更非法西斯群眾，而是「文明化的群眾」，也許是「太文明化的群眾」。九月十五日以及十月十日的兩次大型街頭聚集並沒有和國家機器發生衝突，事後，施代表總部，說總部不能挾力違反「愛與和平」的承諾。這個表示也許是誠意的，但也可能是建立在一個並不成立的假設上，即是總部能夠如其所願的揉捏群眾，使群眾要靜則靜，要動則動。事實上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個也許「文明化，太文明化」的群眾，已經給可能的行動方案設定了一定的阻力。主流的群眾並不設想以其身體進行直接衝撞，以達「倒扁」之效果。十月十日深夜忠孝西路現場留下抗爭的群眾，只能說，其組成並非紅衫軍的主流群體，即我所謂的文明化閱聽人群體，而是其他較邊緣的群體（例如，敲打族）。但由於這只停留在我的印象層次，並且由於遭到警方強制驅離的群眾並沒有留下檔案，因此關於那天晚上違反總部「愛與和平」的指令，從

忠孝西路撤退，並奮力爭取路權的群眾，到底其背景為何，已成爲永遠的謎。如果那些非常歡欣愉悅的敲打族群眾，最後竟然構成了爭取路權的主要參與者，那就有兩點啓示，首先，紅衫軍群眾中的確是有階級的不同組成，而這些比較中下階層的甚或社會邊緣群體是比主流中產市民更有行動的激越性。其次，身體的解放也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因爲他們在廣場的空間位置與行動方式都是邊緣的，他們對於總部的認同也是曖昧的。在此，這些特定群眾的社會邊緣性與空間邊緣性其實是相互加強的，並形成一種很不同於主導紅衫軍群體的比較激進的政治意識。我清楚記得，十月十日深夜，總部派出多名立委級的名嘴輪流上指揮車，要群眾體諒大局，離開馬路。其中有一位，爲了要塑造溫情氣氛，一上台就問：各位紅衫軍的朋友，這個運動是不是施主席號召大家出來的？現場群眾的回聲則是：不是，是人民。

近年來，和紅衫軍的主體狀態成最直接對照的是林義雄 2002 年發起的「核四公投千里苦行」的運動。釋昭慧法師對於這種苦行運動的描述是：

義雄先生所設計的活動——靜默苦行，靜默端坐，從頭到尾沒有激情，沒有喧嚷；遇事沉著而彬彬有禮的志工們，則隨時護衛著參與者的人身安全，並維持著隊伍行止之間的井然秩序——這種「非武力抗爭」的形式，讓筆者最感投契。⁷

相對於台灣很多的群眾運動缺乏愉悅，突出悲情，或是像林義雄先生所領導的運動強調靜默、秩序、自我規訓，紅衫軍的群眾運動所召喚的是一種什麼樣的主體？所想像的未來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所能或不能達到的目的為何？爲什麼倒扁總部當初所規劃的竟是林義雄的抗爭模式？這些都值得繼續深入討論。

強調群眾的主體構成狀態，並進而解釋運動的特質與過程，並非要達到一個結論：總部是群眾所單方帶著走的。事實當然並非如此簡單，在這裡，我只是試圖矯正一個運動發生以來一直流行的偏見，特別是來自大眾媒體，把行動力的來源歸諸於總部或施明德，而群眾是跟著走的。我認爲這是不恰當的，理想的分析方式，應該是要闡明群眾與總部之間的結構互動，並把這個互動置放於台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以及更具體的現實政治動態的轉變下。因此，我也在此簡略地討論一下總部與施明德的領導權的特徵，期望能藉此更深入理解群眾、運動與社會。

1.3 「抗拒崇高化」：施明德（或總部）、群眾與社會

⁷ http://www.chilin.org.tw/tom/tom_art11.htm

非常有趣的是，總部（或施明德）最早關於運動的設想恰恰是林義雄式的；根據林義雄苦行運動模式改造群眾，使運動靜默化、編隊化、崇高化。總部要求「絕對靜默」，⁸但運動聚集的頭一天就遭群眾否決了。⁹又，總部規劃了靜坐區的入場退場機制，並在九月九日之前排演多次，但群眾也是頭一天就否決了。總部最初安排了「崇高壯美的」古典音樂，例如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西貝流士的〈芬蘭頌〉和史麥塔納的〈我的祖國〉，之後在運動進行中，總部安排了黨外歌曲〈美麗島〉或〈補破網〉等歌曲，但到了運動中、後期，這些現成音樂（特別是古典交響曲）漸漸被為這個運動所創作的歌曲，例如國語抒情流行風的〈紅花雨〉、各種語言的倒扁嘻哈與倒扁搖滾、或砰砰阿峰的介於校園民歌與流行歌曲之間的倒扁創作，所替代。十月十日的遊行，民眾車輛自發播放的大多是這些歌曲。總之，群眾拒斥「崇高化」或「宗教化」的暗示或激勵，雖不會反對，但會慢慢以自己的方式選擇或開展新的表現形式。敲打族的倒扁口號與身姿的搖動韻律，都是群眾慢慢摸索出來而成為一套吟唱擺動敲打的藝術。而「紅色」之所以為群眾所接受（這是最後被群眾接受並發揚的兩項總部設計之一，另一則是「禮義廉恥」），恰恰是因為在傳統文化符碼裡，紅象徵了世俗的熱情（年節喜氣）與常民的正義感（紅臉關公）。

群眾拒斥「崇高化」的另一面，展現在群眾與施明德之間的關係。群眾與施明德之間並沒有形成一個「十字軍社群」，施明德不是道德領袖，更非奇力斯馬型的領袖。那作為運動的領導者，施明德的「權威」基礎為何呢？群眾為何認可他的領導權？從表面上看，施明德的确是這次運動的唯一領袖，而且似乎壟斷了最後決策權。總部也常常作強化這個印象的宣稱，例如會說：「我們總部會開會，研究可能的行動方案，然後提交給總指揮，由他做最後裁示。」因此，不免有人批評，在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施明德的「造神運動」，使群眾的主體性被壓制，使之從屬於總部，甚至於施明德個人。

但是，觀察運動現場，雖然可以說施明德是受到群眾的支持與歡迎的，但他並不是一個道德領袖，更遠遠不是一個奇力斯馬型的領導者。施明德的現身，從來沒有勾動出狂熱的群眾現象，而只有「適度的」支持與歡迎。十月七日，總部到台中，是環島遍地開花的最後一站，施明德中間進場時沒有特別的騷動，到最後由施明德上台壓軸演講時，群眾給予的也只是比其他講者稍多的掌聲而已。十月十日晚上，施明德遊行隊伍稍晚回到忠孝西路站前，也沒有帶來人群的激勵與沸騰，情緒最高亢的是總部宣傳車上的王麗萍，她高呼施總指揮回來了，但群眾的熱情沒有跟上她的調門。林濁水曾把施明德比喻為搖滾歌手召喚少女的熱情，這只能說是一個從未到場的人的空想或挫折的自我投射。¹⁰群眾從未把自身

⁸ 「遍地開花」回到台北後，倒扁總部司令台後方有一巨幅紅布，上書「絕對靜默」四個大字。見楊渡主編，《紅花雨》，p. 157，台北：南方家園。

⁹ 根據施明德，總部在九月九日聚集開始前就已經否決了這個想法（2006/11/10）。

¹⁰ 林濁水，〈男人權力遊戲，搖滾少女與樸素主婦〉，《蘋果日報》，2006/10/19；另外，胡晴舫也

與這位運動「領袖」同一化過；敲打族經常是背對著總部與施明德，自得其樂，而主體的「閱聽人」紅衫軍也從沒有表現出類宗教的狂熱。施明德的領導權相當大的程度是由於表達了願意犧牲的意志。他自比於殉道的「施洗者約翰」而非摩西或約書亞，是比較正確的自我理解，施洗者約翰是一個「前教會」的英雄現象，也正符合了群眾其實並沒有把自身視為要為一神聖的任務犧牲的思想。紅衫軍不是一個具有宗教性格的道德共同體，涂爾幹意義下的「教會」。

施明德不是一個像林義雄一般的「道德領袖」，甚至他的形象，都和一般的「道德者」有一些尷尬的矛盾，但這都不妨礙群眾認可他作為群眾的「代表」。民進黨動員施的前妻、前友，以曝光求饒信來抹黑他，其實對紅衫軍群眾而言，毫無任何意義。當然，民進黨抹黑戰術的針對對象也不是紅衫軍，而是綠營群眾，要讓他們徹底相信施明德是一個背叛台灣的失德喪行者，而他為台灣獨立所做的犧牲都是「假的」。

因此，施明德的領導權是被群眾的既存狀態所制約的。施明德提出「愛與和平」的總路線，但「愛與和平」其實是總部與主體參與群眾（即，閱聽人紅衫軍）兩種狀態的交集。如此，那麼十月十日是那樣子虎頭蛇尾的結束，就不是單單「施明德背叛群眾」可以說得通的。以中產市民為主體的閱聽人群眾並沒有留下來繼續抗爭的設想，他們已經創造了一個數十萬人上街的奇觀，他們要回家；他們也不準備衝，但他們並不面對他們並不要衝，而犬儒地想像是因為施明德以繮繩套住他們所以沒衝，於是他們又勇敢又安全。施明德真正「背叛」的是這個運動的行動派少數（也許包括不少的敲打族），因為總部在道德上必須對這些人「負責」。想想十月九日晚上，總部的司令台上，有多少副總指揮、多少名嘴，以各種暗示方式（例如要大家帶背包，帶收音機，準備水，準備乾糧），指出明天沒有結果不會散攤。總部（儘管不見得是施明德本人）做這種投機暗示，對信以為真而且打算採取行動的群眾，必須要負道義責任。有趣的是，這些行動派/敲打族，反而一直都是背對著總部但又不離開運動的一群人；他們是廣場的邊緣者，悲劇地等待「晁蓋」。

指出群眾的高度決定性，並非是為總部或施明德卸責，更不是否定總部有其歷史必要角色。如果沒有施明德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登高一呼，發動「百萬人民倒扁」的募款活動，群眾也找不到一個平台發抒他們的鬱卒憤怒，就不可能有這個運動。但如果，總部不是完全順從群眾的既定現實，配合群眾的自我讓渡決策權力，並採取「特定任務導向的代表民主制」的政治構造，而是積極鼓勵群眾公共論述介入，講求某種程度的民主共識形成，那麼這個運動的過程可能也會

有類似論點，紅衫軍群眾基本上是一群逃避「無聊」，訴諸簡單激情，有可能被男人政客所愚弄的一群準歇斯底里的「教徒」或「革命份子」，而這二者是同義詞，對立於回歸日常生活、絕不上街的「公民」，見〈家庭主婦與革命份子〉，《中國時報》2006/10/12。

不一樣。別的不說，為何靜坐區非得設貴賓區？為何「菁英」不能散佈在群眾中，和群眾對話交往，甚或只是一同靜坐？¹¹既然已經形成了菁英與群眾的二分，總部的領導又出現內部分裂（表現在發言人的更換）以及語彙混亂的問題。總部的不行動或採取特定行動，都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從而都要負一定的歷史責任。

那麼，如何理解紅衫軍群眾的這種拒斥崇高化與宗教化的狀態呢？他（她）們有深沈的苦悶與鬱卒，這些都是再真實不過的，但是這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真信者」（true believer），狂熱、崇拜領袖、願意犧牲獻身、妖魔化敵對者，以及「決戰」的心理準備。¹²我認為，這一部份反映了台灣社會（特別是都會中產市民群體）的高度原子化、高度世俗化的社會組織原理，以及某種「慈濟」式的「愛與和平」的文明自覺。但，更重要的，而且更和台灣現實相扣連的原因是，紅衫軍代表台灣社會的一種新興的感覺、意識或力量，它已經受夠了族群民族主義，一種台式的宗教化替代，沒休止地進行善惡二元對立的政黨惡鬥，各是所是，非其所非，戲仿了宗教戰爭的狹隘格局以及圖騰思考，並壓抑某些核心價值，也就是社會生活賴以維繫的直觀是非概念。紅衫軍的確是「烏合之眾」，如施明德所正確稱謂的，但這個以女性為主要參與者的烏合之眾卻代表了一股要超越這種假崇高化、偽宗教化的既存現實。超越的意圖與努力，首先表現在對於運動的各種想要將自身崇高化或偽善的姿態，透過自身的愉悅或烏和予以否定，因此我們看到敲打族與紅花雨這種民眾（或流行）藝術形式的出現。流行的、抒情的、小市民的〈紅花雨〉，在2006年十月「滾過了貝多芬」（roll over Beethoven）；不管是總部所設計的貝多芬第五號〈命運〉，或是「元首」現身的群眾聚集時所偏愛的貝多芬第九號〈合唱〉，特別是後者，簡直是台灣版的〈發條橘子〉（clockwork orange）。不得不說，女性參與者眾，是這個運動得以發展出「抗拒崇高化」的重要因素。

紅衫軍是一個希望的開始。進步的知識份子可以期待並幫助形成已經出現於歷史的這樣的一種群眾，更深刻地結合敲打族的身體解放，以及社會論壇的公共論述，成為最嚴格意義的「自主公民」。但這個期待中的「自主公民」，也必須先從偽宗教化與偽崇高化的束縛中解脫，從而認識到自己的可能性。這個從束縛中解脫的第一步，不容否認，是僅具否定性意義的，而以它為基礎，積極地開拓出日常的、在地的論述社群，使民主參與落實於日常生活，則不能不是下一步要走的。不肯定紅衫軍這艱難的、實驗的、充滿失敗可能的第一步，反而以更高的政治標準（好比所謂日常的多元的在地的反抗實踐）檢驗紅衫軍，並作為否定運動的理由，則是扭曲的。¹³

¹¹ 謝謝王樹德先生提出這一點重要觀察。

¹² 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1.

¹³ 這一方面代表性的看法是張茂桂，〈為何還不是新公民運動？〉，《中國時報》，2006/10/8，A15；何明修，〈社會運動的寧靜革命〉，《自由時報》，2006/10/5；何明修，〈海灘上的公民社會〉，《中國時報》，2006/09/25，A15。我以〈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文，回應張茂桂教授的論點，請見 http://www.intermargins.net/Column/zhao_gang12.htm。

二、運動為何勢消？

在這一節，我將從三方面探討為何這次運動的氣勢從九月十五日之後開始削弱，而十月十日後顯著消沈。¹⁴

雙十天下圍攻之後，運動的氣勢幾乎可以用直沈谷底來形容，雖然九月十五日圍城之後，氣勢就有消退的跡象，但沒有十月十日之後表現得那麼戲劇性。十月十一日早上六點多，我從電視裡看到忠孝西路已經車水馬龍，一切如常，難以想像幾小時之前，仍然在那裡堅持路權的幾百人之間所瀰漫的一種類似被遺棄的悲哀或被背叛的憤怒，以及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前，那裡舉目望去的滿路紅，散發著人挺人的興奮，以及一種朦朧的期望，「可能還是沒有結果，但不應該如此吧！」。十月十一日開始，這個運動進入了蕭條期，十月十三日，總部宣布「休兵」，等待偵辦國務機要費的檢察官陳瑞仁的最後報告，再決定是否發動「海嘯」。同時，總部的戰略似乎又轉化為朝「反貪修法」等方面「長期」努力。但除非有巨大的意外，總部的疲弱似乎沒有回轉的跡象，疲弱特別展現在支持者流失，以及目標多歧。

如何理解運動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中盛極而衰？具體的戰術或人事問題不論，至少有三個「結構性」因素必需納入我們思考與理解的視野。

2.1 運動定位與目標漂移曖昧

這個運動到底算是政治運動（不論稱之為「政變」或是「革命」）還是社會運動？在台灣，以往的運動都比較容易歸類，不是由政黨或國家機器所動員的「政治運動」，就是由政黨以外的社會群體所動員的「社會運動」，前者以政治鬥爭或奪權為標的，後者一般則以特定的政策或特定的弱勢群體的利益為標的。此

¹⁴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七點，火車站前倒扁廣場還是聚集了有兩百位左右的群眾。我問一個坐在總部帳棚外頭的紅衫軍：「施明德還在裡頭嗎？」，他看看我，點頭，慎重地說：「在」。台上有一位幹部在演講，之後大家看晚間新聞，人們三五成群的散坐，聊天，吃便當，看晚報，練太極。這個空間呈現了一種熟人社群的感覺，我走過其中，雖沒有明顯感覺突兀，但可以約略感到這個人群聚集中已經有了某種微妙的「常客」與「過客」的分判，過客不見得有此自覺，但常客一定知道誰是過客。相較於動員高潮期，這個運動的確是「消沈」了，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這個運動從九月初開始，一直到現在，也將近三個月了。在一個開放的室外公共空間進行一個社會抗議聚集，紅衫軍運動不可否認地是創造了一個台灣紀錄，它創造了一群核心的鐵衛隊，以及一種特殊的活動方式。紅衫軍總部和它的核心支持者之間的關係，其實是有趣且值得研究的，因為牽涉到的是有關運動如何持續下去，如何把公共空間當「家」的問題。這段記錄與反思是受何春蕤與卡維波對我所提點的：「這批紅軍領導與周圍小群體（甚至可以影響領導）在這個長期過程中，從起初的日常混亂中，慢慢找出例行與尋常的運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畢竟，要日復一日地活在不是家的街道上，是何等的艱困，但是最終還是「定居」了，有個日常的、涉及人數不少的組織，這是必須敬佩的，也是群眾運動要持續下去的必要條件。」

番紅衫軍運動的非預期敵對面「綠營」，把此運動界定為奪權的政治運動，理由也並非不正當，因為這個運動的最鮮明最直接的目標就是「倒扁」。由於扁被說成「台灣之子」，在此前提下，運動常被抹成「藍的」、「中國的」、或「法西斯」。

儘管這個運動的常民直觀目的是「倒扁」，但這個運動卻因為兩個原因，無法簡單歸類為政治運動。首先，倒扁雖是立即目標，但並沒有任何取而代之的設想；施明德一再表明功成身退不奪權、不成立政黨，即是在確認這個運動並非常規的「政治運動」；其次，在群眾懷抱「倒扁」這個立即的具體目標的後頭，其實是一個企圖面對台灣社會整體性危機（核心價值喪失的道德危機、族群撕裂危機，以及社會生存危機）的朦朧但強烈的危機意識。可以說，在「倒扁」的表面之後，這個運動更深層的所指的是「社會整合危機」(societal integration crisis)。就此而言，這是一個台灣社會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不只是指它的規模，而更是它的特質，它超越了以往台灣的社會運動針對的制度改良或是追求特殊群體正義的「專業化」格局，而試圖面對整個社會的危機，從而必須以代表整個國家機器的「阿扁」為代表。以往不是沒有類似規模的社會或群眾運動，例如野百合學運或是「三二五追求真相」運動，但都可說是政治運動，因為一來，參與者並沒有社會核心價值崩壞的危機感；二來，參與者有較明確的政黨政治傾向；三來，運動得到明確的、實質的來自大政黨或國家機器的支持。

這個運動雖然不是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奪權運動，但是由於核心價值的捍衛或重建、制度的更新、公共論述的深化，這些目標都無從開展（甚至連比較具體的「反貪腐」都無法進一步成為有制度設想與日程表的運動目標），而只是停留在一種模糊的、若存若無的狀態。參與群眾的確有從日常生活的真實體驗而獲得某種危機自覺，但找不到公共化與論述化的機會與管道。在這種狀況下，運動語言不自覺地從原先漂流在「社會整體層次」運動（即新公民運動）和單一目標政治運動（倒扁）之間，在「禮義廉恥」、「愛與和平」的「新公民」話語和「圍城」與「天下圍攻」的擬軍事性話語之間，慢慢地沒有意志、沒有決心、沒有論述地滑向了「倒扁」這一孤立政治目標，並顯現出心力兩不從的狀況。只有在「天下圍攻」失敗，人氣散去後，總部的一些人士才開始再論述新公民運動與制度重建的問題，但力量不足，為時已晚，也難以不給人尋找下台修辭的感覺。這個運動從始至今，沒有清楚地說明，為何它是（或不是）一個只要阿扁下台的運動，或為什麼阿扁下台一定是要達到的第一步，達成這個目標的意義與限制，等等。

總部對這個目標流移曖昧的問題負有最大責任，因為總部所規劃的群眾樣態，最理想的是一靜態的「民藪」，聽其調度，服從其決議，跟隨其目標。因此，若說總部壓制了群眾的論述目標的可能潛力，也不是過份的指責。總部並不要群眾形成目標與手段之間的思辨，因為「手段是由總部討論，而由總指揮最後

決定」。總部難逃以群眾為「籌碼」的指責，也就是以群眾為物理的團塊壓力（物理學所謂的 mass movement?），透過對泛綠政治台面人物的施壓，促其跳出，間接倒扁。當群眾喪失了直接倒扁的資格，或暗中不被如此期待，那麼「天下圍攻」就成爲了一場不得不的表演。

也要負責任的是那些爲運動定義的一群專業者，即，媒體上的名嘴與藍綠立委。除了一二例外，大多也只能把這個運動框架在「倒扁」單一且狹隘的政治議題上，在深入論述運動的深層所指上完全失敗。媒體的弱智化以及幫派化造成了這個運動往藍綠惡鬥方向被論述，而且也的確幫助形成了這個結果。

2.2 群眾基礎無法擴大以及大學生缺席

經過百萬人捐款的醞釀形式，這個運動在九月九日迅速拔起之後，群眾的參與數有高有低，且在之後的螢光圍城中達到頂點，不論是就氣勢或是就數目而言皆然，但是群眾的社會組成則始終沒有改變。

從九月九日一直到十月十日，可以說主要的長期參與者是台北縣市的城市居民、中間階層、服務業者，以及退休人士。外縣市的也有，例如在凱道廣場或是火車站前夜宿的民眾中，有不少是外縣市來的，但顯然不是群眾主力。中間階層與服務業人士多，是因爲參與這個運動時間需求很大，週末或假日之外，一般上班族或是產業工人少有時間與體力作較長時間的參與。也有不少退休軍公教人員，但絕不是如某些刻意要將運動抹藍的論者所言，說他們是主要參與者，這只要到現場看一眼就清楚的，因爲參與者的主要年齡分佈還是在青中壯年這一塊。在這些不同背景的參與者當中，女性明顯佔大多數，七成左右，這是眾多觀察者所無爭議的。婦女參與者不但數目眾多，而且熱情昂揚。在凱道現場我觀察到，絕大多數的現場義工以及無償餐飲的提供者是女性市民；常看到的一個場景是：兩三個中年女性，在景福門對面的凱道邊，在警察面前以及敲打族的喧鬧中，臨時停車，笑容滿面地搬下大鍋大桶的飯菜往人群裡送。至於婦女爲何有這麼高的參與意願，實際投入這麼多的心血，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理解的問題。我初步的解釋有兩點：首先、女性對社會核心價值面臨解體的憂慮比男性來得要沈重也尖銳，這一方面是由於其性別位置（不管是出於好的或壞的原因）使她對「誠信」特別重視，對「欺騙」特別反感；她們常常比男性對基本的「做人道德」有更直觀的堅持。廣場女性參與者說「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時的那種沛然確信，是遠遠超過過份政治化與過份社會化的台灣男性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其對下一代的教養與生計出路的擔心，憂慮這樣的領導者與這樣的政權會搞垮台灣，而「覆巢之下無完卵」，保衛社會即是保衛家庭。其次，長期以來代表「本土」的國族主義動員（排除）的對象比較是男性，不是被召喚的對象，就是被排除的對象，而不管是這兩種位置的哪一種，其實都構成了某種程度的參與壓力。而女性比較是

在這個動員範圍的邊緣，她參與到這個運動的自我限制比男性來得低。因此，在運動現場，本省籍中壯年婦女的參與很醒目。¹⁵

中壯年女性參與者眾，而且是她們的自我組織讓凱道廣場得以維持基本「生活」條件，例如提供食物、雨衣、飲水，維持領餐者的排隊秩序，以及進行必要的清潔活動。這些都不是政治性或是衝突性的「組織」，而是生活的組織，不起眼，但重要；這裡頭經常可以看到一種熟悉的「慈濟模式」的影子。

在人群中走動，族群因素並不明顯，雖然有不少泛藍運動現場常見的老兵，但他們在這個運動中其實很疏離，甚至落寞，相對而言，反而是操標準台語的青中壯年（特別是婦女）人數較多，也更在心情與肢體上融入運動的主調。因此，泛綠抹黑此運動的敘事：「此運動為泛藍所動員，而泛藍即是外省人，而外省人就是「中國人」，而「中國人」即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這些人和「台灣國」以及理應對「台灣國」死忠的「福佬人」為一對立……」，是一不折不扣的虛構。這個運動的參與者在直觀上的非藍非綠，是這個運動在一開始就展現出的一個重大特色，以及取得的成就。這個運動的確有跨越黨派跨越族群的新興特質，說它「綠頭藍身」是不確的。

印象裡，少有產業勞工的參與，這似乎也預知了總部為何難以執行罷工這一項手段。產業勞工的低度參與，當然和他們工作時間固定，缺少彈性閒暇有關。這的確是成立的，但當這樣推論時，馬上被迫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生是時間上最自由的一個群體，但為何在這個運動從開始到目前的歷程中，大學生的規模參與始終沒有出現，甚至可說基本上是缺席的，儘管偶見高中生三五成群的參加。大學生基本缺席，似乎也說明了總部何以難以想像罷課這一手段。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以及現場觀察者，我對我關於大學生缺席的這一觀察有信心，因為群眾中少見我所熟悉的大學生身影姿態。「天下圍攻」前，十月九日晚，台北火車站南側出現了大學生所組成的「陽光反貪青年團」參與運動，但人數最多時大概不到百人；以台灣的大專院校數而言，一校一個代表都不足。這些年輕人又絕大多數表現得非常稚嫩青澀，完全沒有學運社團的油條氣。他們用文旦柚圍成一個台灣形狀，點上蠟燭靜坐，並在靜坐區外拉起一個模仿野百合的「糾察線」，但只招來一些民眾圍觀。這些大學生，其實和之前在凱道現場參與長跪活動的大學生是類似的；最沒有政治意識的大學生反而是最有可能參與到這個運動的。九月九號晚上和我同行的一個朋友，看到「陽光反貪青年團」的怯嫩身影，直呼這些人不是大學生，認為他們「除了少數幾位，大部分其實是高中生！」。我不同意這個觀察，但同意這個觀察所間接指出的，這次參與到這個運動的大學生，人數雖

¹⁵ 卡維波也指出此一現象，但解釋是北部都會女性在全球機會流動之下，成為了最傾向於抗拒排他性族群國族主義的主體，見〈假台灣人——在台華之外的紅藍綠女〉，《中國時報》，2006/10/14，A14。

然少，但其「清純」迥異於以往的「學生運動」。

大學生缺席有三個原因。首先，獨派的本土論述經過野百合學運以來，到今天已經成為霸權，在大學校園取得優勢論述位置，這個優勢不是展現在於這個論述風起雲湧積極地佔據住每個舌頭，而是消極地成為一種「沒有替代的既存現實」，有些類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論述」一般，它的最積極支持者也不過是只能重複地說「沒有其他路子」(There is no alternative!)，這和，好比歷史上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其積極性攫取住了大學生是很不一樣的。這是一種「冷支持」，反映在「扁不好，貪腐不好，但難道要回到過去威權的老路嗎？」這般的模式化反應。大學生基本上是在藍綠的架構下思考，而「綠」雖不見得代表「進步」，但至少代表「本土」。大學生或許依稀感覺到「本土至上」的說法有問題，但由於「本土」這個象徵成功地整合了「本土是愛自己的土地」、「本土是反中國的強權（展現於飛彈與對台國際角色的壓制）」、與「本土是一種不同於中國的文明進步」這三種意識形態質素，而形成了一個強論述。¹⁶ 面對它，大學生沒有論述替代，但又經常直觀地對這個論述起疑，特別是當宣稱「愛台灣」的政權並不見得比以往的政權更「愛台灣」時。¹⁷

誠然，對大學生的政治態度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但目前，我傾向於將大學生對「本土政權」的態度定位為一種「冷支持」，這不同於那「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絕對世故或洞穿權力遊戲的「冷漠」。雖然，大學生的確既不參與到紅衫軍挺扁，也不見參與到挺扁遊行，但「紅衫軍」與「綠營」並非半斤八兩的。發生在十月下旬的一樁事件或許對台灣的大學校園的上述政治生態頗有指標性意義。總部宣布將進入各大學校園宣揚運動理念，但隨即被所有相關大學以各種理由拒絕，特別是「政治力不進入校園」，但沒過多久，綠營的候選人卻被容許進入校園演講。總部譴責大學主事者心態返回到戒嚴時期。這個指責不無道理，但也許更重要的卻一直被總部避談的是，這些大學生其實也一直抱有一種和主事者態度相配合的對於「本土」政治力量的「冷支持」，以及對倒扁運動的冷漠。

大學生對紅衫軍的冷漠態度之後，站著的是恐懼。十月九日，「陽光反貪青年團」在站前集會所製作的唯一一張海報，是一個戴著星條旗高禮帽的「山姆大叔」，雙目炯炯地以食指威逼觀看者（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海報設計絕不是學運老賊會搞出來的），大叔旁邊寫著幾個大字：「年輕人，不要怕，站出來！」。這

¹⁶值得注意的是，龍應台、李家同等人的現代化文明秩序觀也和本土霸權產生了共謀，共同對大學生產生了影響，對民眾上街這樣的體制內公民權利也遲疑、質疑，把「體制內」限縮於「等待下次選舉」或是「相信司法」。龍應台，〈我怎麼上「陳水扁」這一課——一個「甘犯眾怒」的微小聲音〉，《中國時報》，2006/8/24；李家同，〈街頭運動…今天倒扁，將來倒誰？〉，《聯合報》，2006/8/18。對於龍應台論點的批評，見陳宜中，〈龍應台回答不了的問題〉，《中國時報》，2006/8/27, A19；錢永祥，〈兩大黨自私，逼民眾上街〉，《聯合報》，2006/08/28, A4。

¹⁷ 謝謝林正慧與陳信行就「冷漠」問題和我所做的討論。他們指出大學生其實連「本土」也無興趣，只是對一切不關己的事情冷漠而已。他們也指出大學生在「挺扁」遊行上也是缺席的。

九個字並非偶然，因為當晚這群稚嫩的年輕人喊出的口號，也是這幾個字。「不要怕」顯然是反映了學生的某種集體心理狀態，但是怕的是什麼呢？我想不必然是對可能的暴力狀況的憂懼，因為暴力的陰影是在九月十五日以後「遍地開花」階段才吊起來的，而大學生早在這之前就顯著缺席了。「不要怕」的首要所指應該是：不要怕「政治不正確」，不要怕被「抹藍」，不要怕別人說我們沒有「本土意識」。這既是向外號召，也同時是自我打氣。其次，「不要怕」也可能隱含了一種複雜的心裡折射。野百合學運以來，很多學生難免認為「學運」其實是一種隱諱的參與體制政治，獲得權名利的終南捷徑，「瞧！這些立委、這些高官、這些通天幕僚」。因此，在「學運」已經失去了它的質樸求真、年輕熱血的召喚力之下，這些年輕人，當他們在召喚同學時，也從想像中的同學的世故猜度反應折射回來，形成自我的壓力；「不要怕」因此也是講給自己聽的。¹⁸

相對一般大學生，一般民眾會支持或參與運動，則顯然是因為一方面他們並沒有被強勢論述覆蓋，反而能保留素樸的直觀正義（特別是女性與高中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直接頂受生活的困頓（不管是道德的還是經濟的），從中獲得直觀正義與參與力量（例如女性、中下階層民眾、原住民）。受到這個運動深刻影響的這一代高中生，一兩年後進入大學，將會給大學校園政治生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值得觀察。十月十日遊行中，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就告訴我他讀國中的女兒全班都倒扁，「全班呢！以後這些年輕人都可以投票時，民進黨就慘了」。

其次，比較有社會意識的「進步」大學生（例如進步的工運網路連結如「苦勞網」，各種反高學費的團體、異議校園社團，以及參與局部社會改革的團體如「樂生」），則又因其各自的意識形態，以「旁觀者」的姿態對運動持質疑的態度，甚至根本取消這個運動的正當性。「左翼」以這場運動並非「階級鬥爭」、「沒有觸及真正的矛盾」等理由，取消這個運動的正當性，並且不忘補充說「真正的矛盾在於…」。「後現代文化左翼」以「多元」或「在地」當令箭，強調社會鬥爭的在地化、日常生活化，藉此把他們自己和紅衫軍對立起來，因為後者對他們而言，只是針對高層政治體制的運動，目標單一、組成單一，不論成敗，最後還是無法帶來日常生活中的覺醒與培力，反而帶來新一波的權力集中以及單一化。這兩種「進步」的立場，其實都自我解除了參與到這個反映了複雜台灣現實脈動的群眾運動，並向一般人學習的機會。沒有進入到群眾的主體感受中，如何知道這裡頭沒有「階級」意涵？又如何理解「階級」是如何在台灣的「在地」條件下展開？沒有參與到群眾的感受中，又如何知道這裡頭，除了外顯的「倒扁」之外，沒有涵化眾多「日常生活」的苦悶？如果不從這裡開始，又從哪兒開始？「樂生」、「苦勞網」必須要面對自己事實上也被充斥於大學校園的政治正確恐懼所覆蓋這一事實，進行深刻的自省，真實面對自己的弱點，才能誠實面對自己所宣稱的運動路

¹⁸ 謝謝汪立峽指出此點。

線。和這些大學學運份子（其實其中包括很多研究生以及「後研究生」）有類似反應的，也許是台灣的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她們對這個運動大致冷感，雖然這個運動的七成參與者倒是一般意義下的「中產階級」婦女。女性主義者對眾多女性熱誠參與的一個運動不感好奇或有敵意，是因為這些女性是「父權社會下的母職捍衛者」，還是因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本身也覆蓋在一種「本土」的政治正確之下呢？

最後，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或許也幫助形成了大學生對紅衫軍運動的冷漠態度。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2000年之後，台灣的經濟每下愈況，人們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在這個「後富裕時代」中，即將要進入到社會的年輕大學生，對未來充滿了焦慮期待，而由於不像已經在現實生活中遭受到重大挫折的婆婆媽媽或中青失業者或半就業者，他們畢竟還沒有機會證驗他們各自的未來生路會是如何，這使他們對這個運動反而比較會有一種機會主義的疏離。我有一個還算是有些理想性的學生，對紅衫軍群眾的評論竟是：「這些人都是吃飽沒事幹，我沒那麼好運，哪有那些閒工夫！」相較於1990年代初，台灣經濟景氣下的大學生自我感覺，現今的大學生顯然表現得比較「自私」，比較會「生涯規劃」，比較會「時間管理」。

以上三個原因，僅僅是嘗試性的可能思考與研究方向，需要以後更深入的探討來修正或否定，但是，就算這些思路都不成立，這個原始問題是必然成立的。近代以來，多少社會的變革或革命，不是最初的導火線來自大學校園（例如五四或是法國1968年五月革命），就是大學校園因其低燃點，迅速接續源自他處的變革之火，大片延燒（例如北美洲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接續了黑人民權運動的首火）。此次的紅衫軍運動綿延月餘（還不算初期的募款過程），卻始終沒有在大學校園產生影響。何故？這是需要回答的。

群眾的社會組成沒有突破，但運動領導集團的組成反而有了「突破」，從「前線寡頭」慢慢轉變為「前線與現藍共和」。但這個「突破」反映的可能是運動本身的發展沒有突破，甚至受到嚴厲的挑戰，關於這一點我會在下一節比較詳細的說明。藍的國親公職人員加入前民進黨菁英所組成的領導集團，很可能使運動的進行更加保守，這是因為他們可能各有政黨與選舉考量，何況大多數人也向來不是社會運動的堅定支持者；他們表態反扁，但時刻拿捏如何不因倒扁而損及他們的特殊個人或政黨利益。運動的枱面被藍營的各層級公職人員（或候選人）所佔據的現象特別清楚地展現在台北市以外。十月七日晚上，倒扁運動遍地開花環島之旅的最後一站台中市現場的前半場，幾乎成爲了當地藍營公職人員輪番作秀的舞台。

2.3 本土牌再度威力發功

但這個運動勢頭走頹的更重要原因是：泛綠核心終於不顧一切打出了「本土牌」，把「倒扁」與「挺扁」定位為藍綠對決與南北對立，甚而至於中國與台灣的對立，藉此統合了泛綠，從而影響了整個局面。總部在面臨重新統合的綠營之下，只有一步步地接受藍營的資源支持與決策進入；大批泛藍公職人員湧入，造成了決策領導系統的組成轉變。這是外顯的變化，但不那麼明顯卻也許更重要的是運動參與者甚至運動旁觀者所感受到的快速轉劣氛圍。關於這個變化，我舉一個切身例子就夠了。九月九日到九月十五日這七天，我天天都去凱道觀察並攝影記錄，我八十多歲的老母親都很放心，但到了十月九日，我出門前，她就表現出對我的安全的格外焦慮，「要小心唷！」。這說明了亮出本土牌以及暴力的升高，的確是嚇阻中產市民（特別是女性參與者）的有效方式。¹⁹絕大多數中產市民進到廣場走上街頭時，他們的意識狀態本來就有矛盾不安的因子，一方面，政治的腐敗、社會的危機，使他們相信走上街頭抗議是正當的、最後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的確難於立即克服他們長期所默化的「秩序」共識，對「社會運動」這個理念還不由自主地帶著些許陰暗意識。當紅衫軍尚未遭遇挑戰時，陰暗意識無從萌芽，但當「族群衝突」、「南北衝突」以暴力的形式出現時，就必然給他們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讓他們自我懷疑是否是由於自己的行動帶來了社會動盪。這種自疑心情在九一五之前是沒有的。

「九一五」不得不是一個分界點，之前，這個運動雖經風雨，但是信心越來越高漲，直達九一五螢光圍城的高峰。這一方面是群眾的情緒與能量一直積累匯聚，非在九一五那一夜找到宣洩的閘門不可，但另一方面，整個外在環境，除了綠營的核心媒體冷眼報導，機會主義唱衰之外，媒體（至少是兩大報）是熱情的、簇擁的，而綠營也有鬆動的跡象，至少幾位「天王」都開始有離心離德的樣子，行政院長蘇貞昌也開始試探地自謀出路。這時候的綠營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觀望紅軍的氣勢與陳水扁的窘境，不即也不離。九一五之後，綠營以游錫堃為首，代理阿扁，大打「本土牌」，激烈升高種族主義語言，逼使綠營在本土保衛戰的大旗下重新統合，從而把紅衫軍抹藍，抹中。總之，泛綠陣營給自己的動員理由是：只要為了「外抗強權」，即使是「國賊」也要拼死維護。

這個轉變，我認為是在施明德以及整個前綠營的倒扁總部成員判斷之外的。他們過於樂觀，判斷綠營大老會接二連三加入倒扁，期待天王們與林義雄甚至李登輝，明確表態倒扁，但除了李登輝左右逢源之外，其他人先後回歸支持陳水扁，終於鞏固了陳水扁所期待的「藍綠對抗」的外在形式。

綠營沒有如期望發生離心效應，反而重新鞏固在一貪腐事端百出的總統

¹⁹ 卡維波，〈肢體暴力的排她：自主公民如何看待暴力？〉《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展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2006，pp. 64-67。

旁，達成高度的團結，是這個運動的最大外在變數，而且是總部所沒有判斷到的。施明德說，他在運動之前就知道民進黨會打族群牌。我相信他有過這個判斷，但問題是他不會想到族群牌會拉高到這個地步，以及會這麼有效，成功瓦解了他所有的分離遊說與他所領導的群眾的團塊壓力。

三、分裂的國度與顛峰的「本土」

運動剛開始時，的確是有超越藍綠的新氣象，因為大多數穿著紅衫的民眾的確不是為了「藍」（誠然更不是為了「綠」）而站出來，而是為了超越藍綠（也就是不管你是藍或是綠都應會支持或至少沒有理由反對）的價值（例如清廉、誠實、反對族群撕裂）而站出來、走上街。這也是為何論者看到了這可以是，也應該是，「自主公民進場」的契機，以及「新公民社會」的雛形。²⁰至少到十月十日「天下圍攻」那天，大多數的群眾應該都還是懷抱著一種超越或無關藍綠的心情參與運動的；他們也許有藍綠政黨認同，但不認為這個運動是來談論或強化這個認同的，因此他們克制自我，甚至連國旗都甚少出現，在凱道的前七天更是完全不見。我多次目睹群眾堪稱苦口婆心地勸阻一位情緒顯然因王麗萍「口誤」而明顯衝動的老先生持巨幅國旗入場。藍的甚至深藍的群眾對王麗萍明顯並非口誤的「台灣國」呼喊，其實並沒有認真追究的心情，反而是對他們素來並不熟悉甚至還有些拒斥的文化與象徵，有了些身體力行。如觀察家鄭鴻生所指出，在這次運動中，原先是藍的群眾開始透過對於原先被綠營所壟斷的黨外歌曲（例如〈補破網〉、〈望春風〉、〈美麗島〉…等）的學習，開始了一段心情上的、情感上的大和解。²¹

因此，說這個運動具有彌足珍貴的「超越藍綠」新契機，並非一廂情願的投射，而是奠基於兩個事實：其一，核心社會價值的優位共識，其二，新生的大和解心情。它們是這個運動的永恆遺產，不管倒扁是否成功，運動在這兩處所灑下的種子至少有了成長的可能。

儘管紅衫軍群眾試圖「超越藍綠」的主體狀態從聚集以還的一個月來，可說是並無顯著改變，但弔詭的是，這並無法扭轉這個運動本身陷入藍綠惡鬥之中，以及在效果上，重新啟動或激化了藍綠惡鬥。指出這個弔詭，並不是要企圖歸罪，不管是像綠營的名嘴要紅衫軍總部或是施明德負責，或像藍營名嘴要民進黨高層負責，或是指責「南部暴民」，等等，而是透過這個機會，更深入地探討台灣社會的分裂狀態與出路問題。

施明德說「倒扁，只是把族群對立變成顯性」，並不是卸責的話，但也不

²⁰ 趙剛、陳宜中、廖元豪，〈自主公民進場〉，《中國時報》，2006/08/31，A15。

²¹ 鄭鴻生，〈從「雨夜花」唱到「紅花雨」〉，《聯合報》，2006/10/05。

完全正確。不正確是因為九一五之後所出現的對立態勢，並非族群衝突，因為儘管綠營所動員的群眾雖大多為中南部福佬人，但紅衫軍並非一外省群體，外省人（或有外省人認同的參與者）在紅軍中一定是少數，更何況不管是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或是原住民，當他們參與到這個運動時，已經把「族群」身份的優先性讓位給公民身份（以其所追求的價值而論）了。所以，紅衫軍運動和九一五之後迅速被動員的挺扁群眾之間的衝突，如表現在「遍地開花」路程中的，並非單純意義的「族群衝突」。

那麼，是什麼衝突呢？是社會核心價值和所謂本土之間的衝突嗎？也不是，因為綠營及其號召的群眾也並沒有反對「反貪腐」這樣的核心價值。衝突兩造各自捍衛的是並不具有直觀對反性（例如，「環保與發展」、「自由與公平」、「個人與集體」）的「反貪腐」與「本土」；誰說愛鄉愛土就得反「反貪腐」了？因此，真正對立的不是這兩個價值。說得更精準些，並沒有兩組凡俗價值在真正對立，而是「本土」被拉抬到一神聖性位置，而任何現代性「凡俗」價值，在任何條件下，皆不可挑戰「本土」這個擬宗教化的最高價值，這即是「本土優先論」(Taiwan over all)。²²如不健忘，在2004年大選前的「陳由豪事件」過程中，就有長老教會高階牧師施壓給事件關係人沈富雄，警告他不可說實話，理由是：為了「本土政權」，說謊可也。這本來是一拾撫可及的「本土優先論」說法，但由長老教會的高階執事執而言之，則更能洩露「本土優先論」的神聖性，因為「本土」這個特殊主義指涉本來理應是臣服於基督教的普世主義，但在台灣，它卻高於一切。在此脈絡下，就算是提出〈七一五宣言〉的泛綠學者，所能做到的其實也只是提醒「本土」這個「至高價值」需要以民主價值來搭配、充實它而已，並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民主或人權等普世價值為優先，副以「本土」。但話說回來，這個〈宣言〉雖然還遠遠不是一個「啓蒙運動」，但也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宗教改革」先聲了。

「本土政權」不必經常啓動「本土優先論」，甚至，在這個政權相對從容有信心之時，也能暫時讓「本土優先論」處於待機狀態，並對進步價值表示優容善意，例如民進黨在2004年九月時，當槍擊案的質疑已經漸次沈寂時，就會提出〈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至少敢口惠於「多樣性」或「多元文化」這些概念。但是，只要當此政權（及其肉身象徵）受到挑戰時，「本土優先論」就隨時可以恢復啓動——假如本土化身的政治人物作此選擇。因此，反貪倒扁運動（或就此而言，所有挑戰「本土政權」的力量）只要不強，「本土政權」就可以選擇不啓動「本土優先論」，而當威脅到了一定程度，就可隨時啓動裝置，將質疑、批評與挑戰（不管合理與否）定位為對本土政權的「外來挑戰」，而此「外來」就是「中國」。一旦敵對態勢升高到這一點時，「本土政權」就可以達到對其

²² 這和二三十年代，威瑪極右派以及納粹德國的流行口號：“Deutschland uber alles” (Germany over all) 有某種奇異的跨越時空輝映關係。

成員的幾乎完全情感綁縛，而無人敢於冒「逐出教會」(excommunicate)之風險，不管他或她的綠色資歷有多深。這是如施明德這樣的美麗島前輩在發起倒扁運動後所面臨的所有否定、污蔑、與踐踏的唯一解釋。而林義雄起先選擇噤聲最後曖昧挺扁，李登輝不情願不倒扁但又不得倒扁，以及新潮流系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唯一解釋。

倒扁總部積極於切割陳水扁與民進黨，並一再保證倒扁並不倒民進黨，而呂秀蓮繼任也不牽涉政權改換的問題。這一切的說明都是為了解除本土政權啟動「本土優先論」的引信。但這些努力明顯失敗，因為「本土」是一個擴大化的家族隱喻，而「外人」的任何切割，都無法讓家族放棄不肖子。不肖子有萬種不是，但也由不得「外人」說三道四，更不可能交由「外人」發落。更何況陳水扁作為「台灣之子」的本土化身光環，代表了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的第一個「本土」總統，承載了「被壓迫的台灣人」才剛剛開始出一口氣的心情，一直還在那裡。施明德說倒扁運動讓它變成顯性的，其實正是這個隨時可以被由上而下啟動的被壓迫意識與屈辱意識，²³而最易於被啟動的人群的特徵則是福佬男性、中年與老年人、與中南部工農民眾。這裡其實有非常複雜的歷史文化因素（例如日本殖民、冷戰、國府統治下的特定世代經驗），以及社會結構因素（例如，城鄉、階級、性別）的共同作用，而非僅僅是一般意義的「族群衝突」。

是這個對立於一最終可以是邪惡的（或「不義的」，或「其心必異」的，或因情境而調整的其他各種形容詞）「外人」，的擬宗教與擬家族的「本土」概念，讓台灣人民一直處於一種無法真正完全癒合的對立狀態，時而狀似癒合，時而創傷崩裂。一個分裂的國度(divided nation)的直接後果就是——如這次紅衫軍運動所展現的——就算有再多人上街，這個數目都不具「代表性」，不是「公意志」的展現，因為這些人只能代表「他們」，不代表「我們」。這才能理解為何幾乎上百萬人上了街，但政權可以說是幾乎不動如山，因為在一個分裂的國度中，最大的政治危機是來自「自家人」的質疑。這個「本土優先論」與「分裂的國度」的歷史遺留可說只有時間才能解決，雖然時間的長短取決於很多因素。在這之前，任何挑戰（不管是非黑白是多明確）所謂「本土政權」的力量，當它到達一定的威脅程度，一定會面臨「本土優先論」的啟動與白熱反撲，而弔詭的是，當它的支持者越來越少時，它的激烈程度反而更高，這只要聽聽近來中南部地下電台的言論與情緒即可體會，主持人與扣應者選擇完全無視陳瑞仁起訴書的合理部分，而認為阿扁是遭到「外人」構陷，而深刻地感覺「鬱卒」。被「本土」所加持的政權所能動員的支持者並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但卻是這個社會最具衝撞力、情緒暴烈指數最高、以及敢於使用暴力的一股龐大力量。這一股群眾基礎，當它為某些

²³ 在運動的這段期間，陳芳明不止一次地譴責民進黨高層一直在操縱並利用這個自卑感的集體意識。《聯合報》陳芳明專訪〈進步的本土主義〉2006/10/30；完整版本請見 http://city.udn.com/v1/blog/article/article.jsp?uid=yashih&f_ART_ID=515512。

政客所附，總是可以從而裹脅整個泛綠政治集團（包括其中較世俗化的成分），使原本可能有施展空間的普世價值，退位給不是「支持本土」就是「反對本土」的二元對立，這一定也裹脅了司法，使原本可以單純的法律思維讓位給立場思維，而立場思維反過來包裝「法理」。²⁴這使得社會對於貪腐不義的政權的規範，除了等待任期結束或是進入以暴易暴之外，別無他路。當一個手握各種國家機器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的執政黨，其社會支持面退縮到最激越的基本盤支持者時，這個社會的前景非常堪憂。這當然不是紅衫軍的責任，而是台灣社會的共業。在這個宿命沒有改變前，紅衫軍或任何將來的挑戰，仍將面臨這一幾乎只有時間才能改變的困局。快速突破的一個可能性就是暴力的攤牌，而這是台灣社會主流共識所不能接受的。另一個可能性即是地緣政治的重組，但這又不是我們的意志所能及的範圍，以及行動所能著力的所在。

那怎麼辦？看來，這個倒扁運動的重要意義之一即是透過這個運動，我們瞭解也許扁下台的唯一機制是任期屆滿，而非其他。而由於陳水扁已經成功地證明他在鬥爭中的存活與勝利，在可見的未來，他將更不會遭到來自黨內的挑戰。全黨將團結在他下面，與整個社會的一多半抗衡。爲了要維持自己的地位以及挑選繼承人並盤算民進黨的總統大選的勝利，這一年多剩餘的任期必然是繼續啓動「本土優先論」，深化或戲劇化兩岸矛盾，使張力達到臨界點，從而極大化他的個人權力以及民進黨的勢力。在國度分裂的態勢下，以追求進步價值爲目標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也將缺乏施展空間。人們以體制的方式走上街頭，本來就是要救另一體制（政黨與選舉制度）之窮，但現在似乎卻只有回到這一有了病的政黨政治與選舉體制。

在兩岸關係持續敵對下，本土優先論不可能淡出淒消，唯有持續被政治人物動員，因爲在「民族國家敵對」下，一個主動拉高敵對姿態的政治力量，經常在論述上取得優勢位置，從而變得更有力量——這是何以國民黨經常被指責爲「沒有論述」的主要原因。而這次紅衫軍運動的走弱，也等於產生了鼓勵貪腐政權繼續加碼使用此一手段的後果。必須承認，在台灣社會內部找不到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法，只有讓時間來解決，然而時間似乎並不在我們這一邊。要積極地解決這一長期撕裂社會的台式民主及其核心的病態政黨政治與選舉體制，必須要解除「本土牌」魔咒，而這又必須從化解兩岸關係的敵對做起。化解兩岸敵對，兩岸都有責任。雖然這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適合地方，但或許可以草議幾個重要和解步驟。首先，雙方都要反思悲情的歷史敘事結構，從而相互同情理解對方；中國大陸不可以大欺小強求弱者配理解，而不付出相對的理解功夫。其次，雙方都應

²⁴ 寫作這段時，陳瑞仁報告尚未出來，而我對這個報告也沒有信心。這個報告的內容證明了我當初對它會保護當權者的預估是錯的——特定個人還是能干預歷史的！雖然寄望於特定個人已經是夠悲觀的了。但陳水扁挾行政權對這個報告的全力反擊，以及綠營從短暫的張惶失措退回挺扁硬殼，顯然又支持我的預估（2006/11/9 註）。

努力消解敵對軍事態勢，中國大陸要撤除以台灣為對象的飛彈部署，台灣也應從唯美日馬首是瞻的對中國戰略圍堵聯盟中一步一步中立化；作為大國，中國大陸應優先表示善意。最後，兩岸籌組中華邦聯或其他形式的鬆散並有實質進步意義的聯合，為西太平洋與世界的和平、民主與社會正義作出貢獻。

「本土優先論」、「分裂國度」、「兩岸關係作為台灣民主核心」，是紅衫軍運動所客觀展現出的意義，其警示意義遠超過以往所有透過選舉衝突而展現出來的。這讓我們得以清醒不浪漫地面對嚴酷的現實，從而也是一種「培力」。紅衫軍運動再度證明了，「本土優先論」在台灣社會民主化將近二十年之後，仍然是最頑強的社會動力，它催生了民主化，但是功成不退，繼續蟄伏，隨時等待被「本土」所加持的高層政治人物的啟動。現在流行講「轉型正義」，但對此一概念，本土新政權並沒有豁免權。轉型正義至少也要包括新政權自我取消「族群動員」或「本土優先論」此一「必要之惡」。此外，這個運動也展現出一個鮮紅的意義，即是百萬紅衫軍進場的歷史意義。儘管我們看到了參與群眾的原子化、機會主義化、閱聽人化，也看到倒扁總部的菁英主義的群眾關係，但單是這麼多人以其超越藍綠或族群意識的公民身份，並懷抱反貪腐、誠信、公正等基本價值，就是這個社會企圖超越擬宗教化、擬家族化的「本土優先論」的初步自覺努力。之前，這個對社會核心價值的意識是若存若無的，但透過陳水扁以及他的人馬的貪腐事端以及悍然自保的行動，這個若存若無的價值反而得以現身，得以自我確認。人民藉由倒扁找到了一個公開重新肯定此集體意識的劇場或儀式機會。拉長歷史看，陳水扁提供了進步價值找到公共自覺的一個機會，因為他，台灣出現了九九世代（9/9 Cohort）。這是歷史的契機，也是「本土優先論」自掘墳墓的契機。但有多少時間，能讓這初生的公民意識與普世價值繼續前進，從而有機會化解兩岸的敵對，建立團結的、能讓進步價值成長的台灣新民主，並與彼岸分享此經驗，則是未知之數。

當這麼多在意識上準備超越藍綠、追求社會核心價值的運動參與者，主觀上愕然發現，儘管幾十萬人上街數次，但陳水扁只要啟動本土牌，一切的努力都將不敵，而且還得擔負社會動盪的罪名時，這個群眾運動的挫敗感或許有轉化成犬儒的可能。不只是倒扁總部要面臨動員疲乏的困局，任何思考這個運動的長期可能效應的人士，也必須要面對這個負面可能。但進步知識份子現今也唯有以「小苗一定會長大成樹」，以「時間是足夠的」為信念，努力開展公共論述，解放「本土」的進步的、世俗的含義，幫助進步價值的推展，催生進步價值得以依靠發展的制度與法律（例如降低南北的經濟與社會差距），並幫助公民之間的對話關係，形成進步公眾，則是唯一的一條應該付諸行動的路。用丘延亮的話：「除了振衣再戰、弄假成真，豈有其他選擇！」

四、紅衫軍運動的全球歷史意義

在指出了此次紅衫軍運動的特點，嘗試解釋了運動在動員高潮之後何以勢消，以及試圖釐清「本土優先論」以及「國度分裂」的危機與啓示之後，最後，我想從一個比較全球的脈絡簡單討論此運動的歷史意義。

新世紀以來，蘇聯解體之後的獨聯體的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等國相繼出現了政權的快速轉移，經常表現為群眾上街，以非暴力的「優雅」方式，抗議選舉不公、腐敗與經濟惡化。在手持花朵的或以各種顏色表徵自身的街頭群眾的抗議下，長期執政的被抗議政權快速倒下，而由為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接掌政權。這樣的政權更替，一般稱為「顏色革命」。這些被推翻的政權，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標準，都是所謂的「不完全民主」，雖有選舉或政黨等制度，但因不同原因，並沒有展現出完全的「自由主義民主」面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即是執政黨操縱選舉，造成長期不公。這是論者認為在中東地區，可能爆發「顏色革命」的下一個國家是埃及的主要理由，因為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存在，但不完全；總統穆巴拉克執政已達二十五年之久。²⁵

台灣爆發這種「顏色革命」的歷史時機已經在 2000 年政黨輪替時消失了，因為透過選舉，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政權已經下台，而代表新興反對派的民進黨已經執政。雖然，在此之前的整個九〇年代，已難謂國民黨操縱選舉，也難謂國民黨的腐敗現象有明顯的升高。同時，國民黨執政下的整個九〇年代，整體經濟並沒有下沈狀況反而基本上完成了產業轉型，所得分配結構也沒有產生像 2000 年之後的惡化現象。

反而是 2000 年之後，在代表「民主」與「進步」的新政權執政下，台灣的經濟成長萎縮，失業率暴增，貧富差距升高。2004 年的總統大選，甚至被至少全國一半的人民懷疑有舞弊嫌疑。在 2005 年底，從高雄捷運外勞抗暴開始，更是爆發了一連串的腐敗弊案，至今未歇。而這些都是在美式自由主義民主標準下，按照憲政程序、政黨競爭、自由開放的選舉機制，所成立的政權的執政下所發生的。

因此，紅衫軍運動的出現，僅與「顏色革命」有表面類似，例如顏色的突出，手段的非暴力，或是反貪腐的訴求。但這些只是表面的雷同，更重要的差異存在於運動所從出的政治社會結構，以及主體的狀況。台灣的紅衫軍運動並非是一個追求形式民主的運動，因為一種具有台灣特色的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基本上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已經完成了，且在 2000 年三月十八日的政黨輪替總統大選，打下了最後認可大印。和一般所謂的顏色革命是追求美式形式民主的方向

²⁵ 〈美國全力推進顏色革命控制中東擠壓俄羅斯〉，
<http://news.sina.com.cn/w/2005-04-04/10186281045.shtml>

恰恰相反，紅衫軍運動是在形式民主已經完成的前提下，反過來指出形式民主（至少在台灣）所展現的重大問題，而且無法以形式民主本身來解決：貪腐、國度分裂、政治領導團隊缺乏基本道德、國家機器無節制地往財團傾斜、貧富差距極化……。

紅衫軍是否能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不能。但這不是關鍵所在，關鍵是在於透過這個運動，我們得以理解到很多極其嚴重的問題必須要找到一個超越「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架構來獲得解決。這是紅衫軍運動，自覺或不自覺，的一個重要歷史介入，有全球意義。這個運動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民主政治就等於是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這樣的機器政治嗎？如果是，為何在出現了這些巨大的社會病象時，這些機制無法有效回應，甚且這些機制本身即是這些病象的病源之一？這其實也等於在問：民主政治，或任何的政治，可以不講實質嗎？如果是的，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政治的「實質」問題？紅衫軍群眾也許缺乏足夠的語言，無法確切地論述出政治機器與實質社會人生之間有必然且必要之關連，但紅衫軍提出「禮義廉恥」的四個大字，不就是深刻地表現了這種深層的對代議政治、政黨機器、選舉制度的不足的焦慮嗎？對紅衫軍而言，政治是要有道德的內容的，不能只是一種程序，雖然程序也是必要的，但並不是充足的（「民選總統」又如何！）。此外，這個內容更不可以只是國族或民粹的「崇高化」的虛幻滿足，而必須是有日常生活的內容。這是紅衫軍裡頭，女性在參與上構成了壓倒性的多數的重要原因。紅衫軍的抗拒崇高化的特質，也讓我們看到了某種理性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激進民主的萌芽。

紅衫軍運動不是「顏色革命」，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更在於一個極簡單的答案：在全世界各地支持「顏色革命」的布希政府，反而是對紅衫軍沒有好感的——儘管在紅衫軍的三次超大動員過程中，沒有一次發生暴力，都是平和收場。布希政府對紅衫軍表示了戒慎與敵意，其實更是因為紅衫軍展現出了一種新的歷史主體，指出了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侷限，要求政治有實質內容，政治必須要回應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與道德直覺。雖然如此，紅衫軍總部的政治意識可能是落後於紅衫軍運動的，因為總部的運動方式還是停留在一種菁英領導並「代表」群眾的模式，即我先前所謂的「特定任務導向的代表民主制」。施明德怒斥美國在台協會如同帝國駐台總督府，是因為楊甦隸粗暴干涉內政，但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作為一種觀念與力量，是反對紅衫軍所展現的實質民主政治意涵的。當然，美國支持某特定政權也非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式自由主義形式民主」的要件，而是因為該政權符合美國的帝國利益。

紅衫軍運動，或許就其倒扁此一直接目標是失敗了，但是，由紅衫軍所引領出來的對於「民主政治」的反省，可能是紅衫軍運動的另一主要貢獻。如何進一步詮釋紅衫軍運動的激進文化意義，從而帶領出一個關於民主想像的新五四運

動，或許才不枉在那麼多日子裡，懷抱著無限朦朧期望的群眾，在風雨中、在烈日下的行動。歷史將記著九月九日是另一個如五月四日的抗議聚集，而九九運動則是另一個帶領文化與精神革命的新五四運動。²⁶當然，這個九九運動不是另一個五四運動，因為每個時代的人們所面對的問題總是不一樣的，而我們「必將另立新義而戰，且以不同之名」——如威廉·摩理斯一百多年前所言。

初稿完成於 2006/10/21

修正二稿完成於 2006/11/05

修正三稿完成於 2006/11/21

2006/11/27

參考書目

²⁶ 謝謝丘延亮提出這一歷史的比喻。要區分開運動立即的成敗，和運動在思想與意識上所帶來的巨大但卻非立即的變化。

中文部分：

- 何明修，2006，〈社會運動的寧靜革命〉，《自由時報》，2006/10/5。
- 何明修，2006，〈海灘上的公民社會〉，《中國時報》，2006/09/25，A15。
- 卡維波，2006〈假台灣人——在台華之外的紅藍綠女〉，《中國時報》，2006/10/14，A14。
- 卡維波，2006，〈肢體暴力的排她：自主公民如何看待暴力？〉《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展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李家同，2006，〈街頭運動…今天倒扁，將來倒誰？〉，《聯合報》，2006/8/18。
- 林濁水，2006，〈一元主義小心社會撕裂〉，《中國時報》，2006/09/21，A14。
- 林濁水，2006，〈男人權力遊戲，搖滾少女與樸素主婦〉，《蘋果日報》，2006/10/19。
- 胡晴舫，2006，〈家庭主婦與革命份子〉，《中國時報》2006/10/12。
- 陳宜中，2006，〈龍應台回答不了的問題〉，《中國時報》，2006/8/27，A19。
- 陳芳明，2006，《聯合報》陳芳明專訪〈進步的本土主義〉2006/10/30。
- 馮建三，2006，〈編後語〉，《自主公民進場：對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觀察與期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張茂桂，2006，〈為何還不是新公民運動？〉，《中國時報》，2006/10/8，A15。
- 楊渡（主編），2006《紅花雨》，台北：南方家園。
- 林深靖（主編），2006，〈公民不服從在台灣座談〉，朱政騏記錄，《新國際》2006/10/20，4-5。
- 趙剛，2006，〈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未發表，
http://www.intermargins.net/Column/zhao_gang12.htm。
- 趙剛、陳宜中、廖元豪，2006，〈自主公民進場〉，《中國時報》，2006/08/31。
- 鄭鴻生，2006，〈從「雨夜花」唱到「紅花雨」〉，《聯合報》，2006/10/05。
- 錢永祥，2006，〈兩大黨自私，逼民眾上街〉，《聯合報》，2006/08/28，A4。
- 龍應台，2006，〈我怎麼上「陳水扁」這一課——一個「甘犯眾怒」的微小聲音〉，《中國時報》，2006/8/24，A15。
- 釋昭慧，2004，〈菩薩躍然活在當前——側寫林義雄〉，
http://www.chilin.org.tw/tom/tom_art11.htm

英文部分：

- LeBon, Gustave. 1960.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 Hoffer, Eric. 1951.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Rude, George. 1959.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